

冰点特稿第832期

作为寨子里最有出息的人，杨文学想让核桃寨有条路。

如今，这条土路正歪歪扭扭地从山脚爬上去。深深的山谷在一边，破败的村庄就在另一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这个寨子里，修路是“天大的事”。去年3月25日动工那天，一寨人都撤下了洋芋地，围到“挖掘机”前看热闹。

可这条路总是被村民们挂在嘴边的路，看起来却寒酸极了：黄泥路面不到5米宽；一些地方积着碎石、落叶或几颗孤零零的小萝卜；还有段路被前夜的雨水冲软，人们将摩托车推上山时，就会在路面上留下七八厘米深的印痕。

杨文学梦想中的路，宽敞，平整，可以容两辆汽车交错驶过，至少也该是条水泥路。核桃寨的路距离他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现在，他只能看着那段路躺在山坡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杨文学只是省城贵阳的一个“背篋”——那种背着箩筐在城里转悠、时刻准备卖力气的人。每将200斤的水泥背上三楼，他能赚到5毛钱。

外出打工后，前几年赚的钱变成了老家的一栋房子。之后的8年，他又攒下了13万元。

如今，这个37岁的农民工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为核桃寨修了一条路——一条2500多米的“烂路”。

望山跑死猪

核桃寨里有核桃树、梧桐树，有一年一熟的苞米和洋芋，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山里的人，踏出了一些人多宽的小路。它们多在山崖边，孩子们走惯了，甚至能挥着竹竿在上面放牛。

不过，想要走出寨子，人们得翻两座山，有时没路了，面前是一面近乎垂直的山壁，村民就扒着突出一点的岩石块小心翼翼爬过去。

核桃寨就这样被困在山里。从这里到达距离最近的汽车站，需要先走40分钟下山，然后再在碎石遍布、几乎没有车经过的进村公路上步行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才能到达。这是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路径。

没有一辆汽车能开到寨里，甚至马车也不行。在杨文学的土路修通前，整个寨子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山上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得由村民一点点背上去。

“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山上背粪了。”杨文学站在家乡的山上回忆。几十年过去了，情况一点也没有发生改变。杨文学说这话的时候，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正背着整整糞球爬上来。他穿着不合身的迷彩服，头发乱糟糟的，鞋子已经被泥巴糊住了，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降至零下，在外打工的儿女们会将钱寄回老家，让父母买一车煤过冬。可是，把煤搬回寨子却是个浩大的工程。

货车司机一路颠簸着开来，只负责将煤卸在进村公路的尽头。随后，买煤的那家就要喊上全寨的劳力去帮忙。几十个人一起背，穿山谷，上陡坡，每人背七八个来回，要将近8个小时才能将一冬天用的3吨煤运完。

背煤的这一天，主人家总得招待两三顿饭。饭菜只有山里人每天吃的那几样——苞谷粒磨成粉末后制成的苞谷饭、酸菜豆米，条件好些的人家，还会切点猪肉。

杨文学偏着头数了数，一年里，这样背煤的日子总有七八十天。他的邻居，45岁的杨贵昌则计算着，每背一趟煤，他至少得在路上歇9次。

“通路了，就有车了嘛！有车我们就再不费力了嘛！”杨贵昌大声说。但随后他又摇摇头补充了一句，“我们这里，没见过车！”

没车进来，更没车出去。每户年产近万斤的苞谷和洋芋，只能跟着农民们待在这没什么出路的村庄。人们留够了口粮，剩下的一部分喂了猪，另一部分干脆就烂在地里。谁都知道，集上的洋芋能卖1元一斤。可没有车，谁也送不走这么多粮食。

在这里的土地上，人们就算再勤劳肯干，也没有收入和存款。

杨文学还记得，寨子里曾经有人想赶猪去集上卖，结果，猪在翻山的路上累死了。

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路，是寨子里的人们最常说起的话题。因此，当去年正月十五杨文学独自一人回到老家时，他毫不意外地在父母的土坯房里再次听人提起。

几个过来探望杨文学的老人与他一起围坐在火炉桌前，每人面前都摆着苞谷酒。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后，话题就落在了“路”上。

“我们这里还是需要修条路。”有人说。另外一个老人叹了口气，“难，怕是这辈子通不了路了。”

在老人们看来，如果有人来牵头修路，最可能就是杨文学。因为至少在核桃寨里，他的存款数量“算得上最多的”。还在1998年的时候，杨文学就离开了贫穷的村庄。他先去昆明当建筑工人，但是那里的活路并不好找。一年之后，他到六盘水的小煤窑背煤。在煤窑里，工人们只能弓着身子爬行。或许是受到每吨煤15块钱“高工资”的激励，杨文学在洞里“背得可凶”，一天能背出来6吨。运气好的时候，他被分到离洞口近的地方，每

天能背将近10吨。

只要隔3个小时能吃上一顿馒头，这个身高1.6米的男人就觉得很有满足了。他在煤窑里工作了一年半，直到有一天，他把一筐煤背出来不久，身后就传来“轰”一声巨响，煤窑塌了。从此他再也不敢做这样危险的活儿了。

12年前，杨文学成了贵阳的“背篋”。他怕“和人抢不过”，不敢进城中心，就一直生活在城郊的望城坡。

他使用的背篋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为了防止藤条将后背割伤，妻子特意用化肥袋子缝制了一个厚厚的背垫。在做“背篋”最初的几年里，每天清早6点多，杨文学就已经站在街边等活路了。他背过各种建筑材料，也背过冰箱和保险柜。背砖的时候，一摆砖头，一摆砖头，从背篋里斜伸出来，他只能弯着腰、叉着手往前走。在他看来，背水泥是最好的活儿，每背200斤水泥上三楼，就能赚到5毛钱，如果是背到五楼，“那可就有两块钱了”，他非常满意地说。

后来，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从乡下接到贵阳，妻子也当起了“背篋”。

靠着这些肩扛手抬的活儿，他们每月能赚五六千元。不过，这一家六口小心翼翼地使用每一分钱。他们住在城郊的一幢“农民房”里，从聚满“背篋”的天桥上走下来，穿过一片垃圾堆就到。这不是栋结实的建筑，以至于

新房时，他指着二楼的房间说：“喏，这两间是给孩子的，另外一间是我和老婆的卧室。”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神经极了，脚下却踩着满地的砂土，和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木材。

“走，再上楼顶看看，我搭了个‘炮楼’。”他冲记者比划着。不过，楼顶堆满了落叶，不知是谁将婴儿的衣服晾在了这座疏于照料房子的顶上。

每过农历新年时，他会回到这座房子里来看看，然后在临走时小心地用一张胶合板挡上空荡荡的门洞。但对于房子的一



杨文学（中）和老乡背着背篋穿行街巷中

选在2011年3月25日开工。

镇上黄色的挖掘机从那条坑坑洼洼的进村公路上开过来，临近山谷将要越过第一道沟坎时，差点翻车。不过，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好日子，几十米长的鞭炮在地面炸响，烟雾弥漫了小半个山谷。

背着婴儿的母亲、正在地里栽洋芋的老人、满山奔跑的孩子都被吸引了过来。就连一只黄狗也围在那里打转。

“我想用5万到10万元左右，先把这条路修通。”杨文学穿着一身新西装，一本正经地回答着前去采访的县电视台

记者，一边笑呵呵地问一句：“老板，你留个我电话吧，下次要背东西还找我。”

这种殷勤带来了回头客。如今，他已经不需要站在大街上“等活路”了。只要每天早上打开手机，活路就会找到他。

或者，当工地的工头要雇人卸下一车砖头时，其他“背篋”总是争先恐后、蜂拥而上。只有杨文学首先想到和工头谈谈“卸一整车的价钱”。价钱谈拢后，他再像个“工头”似地分包给其他“背篋”。

2006年的时候，他甚至花1.5万元买下了一台水泥搅拌机，有时出租给工地，一天就能赚100多块钱。

但从开始修路那一天起，钱就像自来水一样哗啦啦地流出去。挖掘机每天要拿走2000元，如果从村子里雇人铲石、整路，还要每天给出50元。

“给他们自己修路，寨子里的人还要钱，你不难受？”旁人诧异地问。

“那也没办法。”杨文学低着头小声说，“有些家有工出，有些家在外头打工没工出，不给钱咱不公平。”

仅仅就在开工后的一个半月，5月3日，他将最后一笔两万多元带回家，只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了几千周转的钱。

没过几天，核桃寨的路停工了。

给修路凑点钱吧

停工前，2.5公里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修路谁修路

本报记者 赵涵漠 白皓文并摄



杨文学走在“毛坯路”上

邻居家有人跺脚，整个一层地板都跟着发颤。

不过，两间房仅收月租200元，这就是让杨文学满意的地方。即使是白天，这个家也黑乎乎的，只有来客人时，白天才拉亮一个灯泡。他今年从乡下背来的腊肉，挂在布满霉斑的墙上。地上堆着用化肥袋子装着的洋芋，那也是他从核桃寨背过来的。

去年年末，小偷偷弯了窗上的铁栏杆，溜进来，从睡着的杨文学身边偷走了200块钱。这让杨文学心寒坏了，因此，他除了从老家背回吃食，还带回了一只看门狗。

即便在贵阳过着如此窘迫的日子，他仍觉得，这比寨子里的生活好多了。

或许正因如此，去年正月十五那天，老人们在杨文学面前端起了酒杯，叹息着，“就是缺个牵头的人啊……”

刚刚攒下13万元的杨文学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下了两杯苞谷酒，然后拍了下桌子，说：“我来修。”

要是没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

那是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杨文学承认。他回忆起，自己此前从来没有动过一次修路的想法。

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程。此前的十几年间，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要把“串寨路”修好，有一次甚至已经将路段按组别分派给当地百姓，由政府买材料，百姓“投工投劳”，但最后仍然不了了之。

而在去年元宵前，杨文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修路有什么关系。那时，这个揣着几千块钱回寨子的男人的首要任务，是把老家的房子修好。

房子是在2008年砌起来的，一切建筑材料都要雇人从山下背上来。在村里，这算得上是一栋顶气派的房子。灰砖全成了二层楼，一楼是厅堂和厨房，二楼则隔出了三室一厅，明亮宽敞。按照城里的习惯，杨文学甚至曾经考虑要不要在屋内搞出一个“卫生间”。

今年2月8日，当杨文学再次回到这座

切梦想，很快就让位于“路”了。

就在他拍着桌子决定修路的那天晚上，和孩子们待在贵阳的妻子接到了杨文学的电话：“我要在老家修路，多兑几天再回贵阳。”

“挖路是个好大的事情，咱家那些钱，也修不起啊！”妻子着急了。

“要是没有路，修了房子也没意思。”杨文学并不动摇。更何况，他的父母也巴望着修路。父亲已经61岁了，按照村里的传统，一户人家要背煤，全村每家人就都得出一个劳力。儿子不在身边，杨文学的老父亲就得像其他人一样，每年总有七八十天耗在背煤的路上。

第二天一早，杨文学就找寨上几位“主要人物”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回忆起，他们甚至没有画过一张图，只是“站在半山腰指了指”，就确定了整个路径。

山坡上将劈出这样一条路来：以寨子最远端为尽头，穿过杉树林，从山上一路弯弯转转，最后停在山脚一道四五米深的沟谷前。冬天，这里没有水，满地都是旁边小学的孩子丢弃的火腿肠包装纸；到了夏天，几十厘米深的河水就会从这里流过去。杨文学打算在山谷前修一道石梯，让车子从山谷那边一直驶进村寨。

十几年来，杨文学初中毕业后回到寨子里来，曾做过3年生产组长，组织全寨人去修进村公路。除了这些遥远的记忆外，他再没有一点关于“修路”的经验了。对于这个37岁的男人来说，这是一项十分陌生的工程。以至于刚开始时，他甚至说不准自己最后大概能掏出多少钱，耗掉多少时间。

难题很快就来了。路从山谷过来，先要经过熊家寨有什么关系。那时，才能进入核桃寨。乡政府给第一家出了6000元，协调其借出地方，可第二户人家却怎么也不答应，说是万一路修不成，不自搭了家里的土地？最后，杨文学只好承诺自己会掏出21000元“买路钱”。

钱，钱，钱，钱，没钱了

根据寨子里风水先生的说法，杨文学



核桃寨村民当“背篋”凑钱的账本

记者。

此前一天，这个因为“没好多知识”不敢去银行存钱的农民工，从贵阳家里的衣柜里取出了两万块钱，装进背包，然后一路抱紧背包回到核桃寨。“当时除了请挖掘机，我不晓得还要干吗？”杨文学说，他一直以为“把路挖开，把桥随便一砌，应该就可以了”。

于是，他把钱留在寨上，又继续回贵阳做工赚钱。

57岁的大哥杨文书在寨子里帮忙打理这一切。在一个黑色笔记本上，他用钢笔写下了一页很简单的明细：

“杨文学付修路现金记：2011年3月25日，20000元；4月9日，60000元；4月17日，30000元；5月3日，20000元。共计130000元，支付总计123950元。”

以上这4天，大概就是杨文学揣着“巨款”回到核桃寨的日子。而其余的时间里，他都在贵阳继续自己的“背篋”生活。

正因如此，这条路诞生的很多时刻，杨文学都是缺席者。他并没有看到，几百米的巨石堆如何被打洞、埋炸药，再轰隆隆地炸个粉碎；他也没有看到，挖掘机运坏了暴露在山林里的水管，一个穿粉色运动服的小女孩在山下装满水，将白色的塑料水桶用两根绳子系在身上，以一种类似鸵鸟的姿势缓慢地爬上山。

杨文学的存款变得越来越少。3个孩子上了半年英语补习班后，已经交不起补课费了。他们委屈地告诉妈妈：“老师总让我们去办公室。”

像很多孩子一样，过年是他们最高兴的日子。但是在河滨公园的游乐设施外，当他们想进去玩时，妈妈扯住了他们的衣服，“票太贵了，咱们就在外面看看吧。”

杨文学直到现在还记得，娃儿生病去住院，医生让交1000元的押金，可他们那时身上仅有借来的500元。好说歹说住上了院，几天过后孩子病稍好，他就“把孩子偷出来跑了”。

如果按照原有的生活轨迹发展，这家人日子不该过成这样。杨文学脑筋转得快，懂得如何做生意。每次被雇去背货后，临走前，他总是一边展开皱巴巴的人

的路已经出来了形状。

“这里就是我修的路。”杨文学站在山上，像个将军似的把手臂挥动了半圈。

路，像条带子似的绕着这座山，最宽的地方仅够两辆车紧挨着交错而过，最窄的地方不到两米。即便如此，自打这条路挖开后，摩托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核桃寨。当然，遇到沟沟坎坎的时候，骑手还是得喊上两三个人一起把车抬过去。

去年5月份的一场大雨，冲着石头从山上砸下来。已经回到贵阳的杨文学当晚就接到了乡亲的电话：“下大雨，到处垮完啦！”

如今，大大小小的石头就竖在路面上。“原来好好的路，现在出坑了。心疼得很，但还是没办法。”他别扭地笑了一下。

核桃寨的路已经停工10个月了。可当杨文学走在这条路上，还是习惯像个规划师那样到处比划。

他拍了拍一侧的山壁，“这段都得修上堡坎，要不下大雨就塌。”

“还得砌边沟。”他笃定地指着地面，边沟可以防止雨水淹没路面。

随后，他又让身边的记者往地势较低的地方看。除了斜坡上的一片树林，那里再看不到什么了，可杨文学知道，里面还藏着3户人家。那些更加偏僻的人家曾经找到他，希望“既然修路，就绕点道把这边也修上”。如果接下来还能动工，杨文学就打算把路接到那里。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把路从石头里扒出来。”杨文学认真地说，似乎忘了脚下的路已经停工很久了。

被迫停下来时，工程正修到横沟沟谷的那座桥。在那之前几天，杨文学刚刚从镇上买来了10多方石头。穿斗车把石头直接倒进了沟谷，村民们再从谷里把它们抬上来。人们已经砌好了桥墩，但6米长的桥终究没能架起来。

县交通局派人来看过一次，发现即便把桥修好，对面的山坡也太陡了，车根本无法开上去。唯一的办法是放弃这座桥墩，在位置更高的地方修一座20米的桥，通往对面的山坡。

搭在石桥上这两万多元就这样打了水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路，对贵州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